



#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产业分工与合作

■陈耀

##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关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有如下论述:“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强化城市产业就业支撑”。

产业分工合作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行管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质性、同质化发展。”“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 and 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斯密认为,两个具有不同绝对成本优势的地区应该分别专业化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可以增进各自和整体的效益。区域应该根据其绝对优势进行分工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李嘉图则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区域分工理论,认为两个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内分工和交换同样可以获得贸易利益。比较优势成为区域产业分工的前提。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俄林则进一步强调区域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强调不同产业的要素配置比例和要素禀赋

决定产业区域分工。因此,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而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具有相对优势。建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下,企业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区域之间配置资源,实现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达到区域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公司贸易成为重要的贸易形式,城市间产业分工开始向依托产业链的产品分工或产业内分工方向发展。城市按产业链不同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不同层次的区域产业链,城市间基于区域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关系强化了城市间经济联系,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在产业链分工中,生产过程被区分为不同的部分,为了降低成本,低等级的生产活动被外包到一定的区域,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价值链分割”、“生产分解”或“生产碎片化”。区域一体化开始进入功能一体、地理分散的生产阶段。

都市圈产业区域分工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产业间分工,就是不同区域基于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发展不同的产业部门,可称之为部门专业化,它是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产业分工形式。第二个阶段为产业内分工,即不同区域都在发展同一个产业部门,但其产品种类不同,这种专业化可称之为产品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可能是基于比较优势或者规模经济。第三个阶段为产业链分工。虽然很多地区都在生产同一产品,但是各个区域按照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工序甚至模块进行专业化分工,这种专业化称为功能专业化。

在一个都市圈内部,经济技术水平差异最大的城市之间主导的产业分工格局是产业间分工;经济技术条件相当的不同发达城市更多的是基于其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进行产业间分工;发达城

市之间的主导分工模式是产业内分工;而在一个发达的都市圈内可以实现产业链区域分工。

在市场机制完善的条件下,都市圈区域产业分工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但是区域内企业间是有交易成本的。这种成本包括搜寻合作主体的成本;谈判成本,包括降低投机行为的激励机制成本;监管成本;实施成本。在市场机制不完善条件下,这些交易成本更高,从而阻碍区域合理分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介入可以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提供一个良好的信息环境,降低交易成本。

## 京津冀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问题

第一,分工合作的前提是要有互补性。京津冀地区的资源互补性很强。河北的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其政治资源、文化科技资源是其他都市圈所不具备的;天津以外的北方大港,港口资源是其天然优势,除此以外,天津也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第二,内部发展差异大。京津冀都市圈的技术水平从最高端到最低端都有,内部差异很大。工业化程度从初期到后期的差异也很大,北京目前服务业比重已经占70%左右,进入“后工业时代”,而河北则属于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天津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人均水平差距大,但近年来差距趋于减小,京津冀地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2.5倍左右,而长三角地区在1.3倍左右。

第三,“中心—外围”形态显著。京津冀地区是“中心—外围”理论的一个典型例子,河北环绕京津两个核心,要素资源和优质资源都向中心区集

聚,中心成为技术创新的来源,外围地区对中心有依附性。

第四,区际合作程度低。目前我国大都市圈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合作最好的是长三角地区,其次是珠三角地区,最差的是京津冀地区。虽然京津冀地区相互之间也签过很多合作协议,但总的比较起来,无论是从交通基础设施,还是生态、产业、旅游、人才、政策对接、社会保障等方面,京津冀区际之间的合作程度仍然比较低,总体来说,京津冀产业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与其他都市圈是不一样的,其他都市圈最主要是要解决同质化的问题,而京津冀突出要解决的是过度聚集的问题,即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外移,同质化竞争主要在京津冀沿海。

## 促进京津冀产业分工合作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从建设世界级都市圈的高度,加强三地产业合理分工与合作,特别是审慎做好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外移。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好三个问题:清楚界定非核心功能,即哪些产业转出;集中承载地选址,即转移到哪里;怎样转移,应注意空心化、集群化和提升式转移。

第二,着力推动内部发展均衡化,扶持河北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型升级,帮助贫困县发展特色产业,河北要主动对接京津,发展都市型产业;天津要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弱化与河北沿海的同质化竞争,共同申报自贸区。

第三,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建设三地合作的公共信息平台,共建产业园区,举办京津冀合作论坛,发挥民间社团作用。设立国家区域政策委员会,发挥权威的规划、政策、协调等职能。(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什么是启蒙?

广义的启蒙是指普及新知,使社会接受新观念而获得进步,狭义的启蒙一般指启蒙运动。按照康德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运用理智的决心与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启蒙强调使用理性和人类进步的观念,鼓励人们勇于质疑权威与传统的教条,进行批判性的探究,以求了解人、社会和宇宙,进而改进人类的状况。启蒙运动就是使用理性获得自我解放,是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启蒙的一个前提是观念体系的革新。在观念体系革新的同时,快速的世俗化使启蒙得以实现。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这些价值观念的出现以及迅速的世俗化,使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方式。

## 启蒙有多重要?

启蒙的前提是观念体系的革新。观念有多重要?白修德和凯恩斯高度评价观念的力量。白修德认为,美国是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美洲,而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信服的权利这样一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在无意中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观念的变革有多重要?阿克顿说,我们的职责

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正是因为观念体系的变革使得人们的想法变了,才会酿成社会巨变。

## 启蒙运动的新解释

近几十年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新解释至少有三点。第一,启蒙运动被视为泛欧洲的文化运动,非法国独有。近来研究已经将苏格兰和英格兰视为启蒙运动的重镇。第二,启蒙精神并不能刻板地等同于理性主义。与法国相比较,苏格兰启蒙运动就不特别倾向理性主义,休谟、斯密等批判理论的理性主义,强调清思或热情因素在道德思维中扮演的角色。第三,法国启蒙运动有强烈的反教士精神,但是其他地区却未必如此。18世纪苏格兰教会在一群温和派牧师主导下,致力于去除僵化的教条主义,宽容地看待苏格兰教会内部的教义分歧,并承认非国教徒的信仰自由。不少温和派牧师参与到苏格兰启蒙文化工作,成为启蒙运动的旗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家波特重新“发现”了“英格兰启蒙运动”。英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些独特经验也被历史学家所揭示出来。英格兰启蒙运动是启蒙观念从上层渗透到下层的过程。18世纪前期,英格兰原本活跃的启蒙精英的思想渐趋保守、僵化,下层社会反而培养出经验态度或科学精神:“一种经验的态度逐渐深入社会下层,渗透进市井小民身上。”工商业提供众多机会,下层民众逐渐视追求知识为社会流动的管道。许多都市的技工、艺术匠人、工厂主开始有“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热烈追求“实用知识”。在当时,透过公共演讲、流动图书馆与读者俱乐部等管道,科学知识逐渐向下渗透,经验主义态度也散布到社会下层。英格兰的启蒙现象发生在远离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非国教徒兴盛的新都会,例如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

## 科学与启蒙是什么关系?

启蒙运动是对科学革命的继承。科学革命发端

# 启蒙与科学

■李斌

于哥白尼和伽利略,并在牛顿那里臻至顶峰,启蒙运动渴望在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方面能取得跟自然科学相媲美的成就,这种渴望成为它发展的动力。启蒙运动本身是培根计划的广泛运用;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的运用不能仅为己用,还要用于人类生活的改善。如果不了解科学突破对迷信的打击,我们就不能理解启蒙。

承接17世纪的科学宇宙观及理性寻找知识的方法,启蒙运动相信普世原则及普世价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对传统存有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以理性方法检验并改进,产生出启蒙时代包含了自由与平等概念的世界观。迈向真理的道路就渐渐不是基督教思想以神为主,而是如路德、培根、笛卡尔等人所相信的,是得运用人类理性。不管是科学中的托勒密或精神上的罗马天主教会,这些原来公认的知识、哲学、神学权威都要面对人类思想自由自由的挑战和探索。

启蒙运动的观念变革是以科学革命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为前提。由培根主义和清教伦理混合而成的意识形态,导致了社会价值观的重大转变;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思想或行事方式,从而增添上帝的荣耀与伟大;科学研究可以造福大众,实现国家的富强;科学研究是一项统一的事业,既然科学方法不过是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那么人人都有能力献身于这一事业。

启蒙运动是科学文化扩展的结果。科学取得与神学同等的智力等级的顶峰,标志着科学文化的兴起。如果将文化视为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表达,那么科学文化就是科学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及科学在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表达。科学和理性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洛克的自由宪政理论,是对英国革命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标志着科学文化,特别是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已经从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政治领域。自由民主制度与科学活动的自治规范之间具有适应性。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科学研究,两者都得接受理性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有条件

的怀疑精神。

## 中国的启蒙与科学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启蒙始终受到富强的牵引。能否让这个国家迅速富强是衡量一切思想价值的唯一尺度。知识之学取代了智慧培养;工艺技能压倒了人生学问。西方启蒙运动背后并没有中国那种“亡国灭种”的压力,救亡从中国启蒙一开始就是绝对主题。在这样的心态下,很多深刻的有远见的思想理念和精神价值根本不可能充分开展,只有具有工具性效果的东西才可能被接受。

在早期中国启蒙的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比如严复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但是真正最大的影响是“科学”和“民主”。

科学和民主是现代国家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整个现代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极端重要,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科学是人的科学,科学知识只是载体,没有科学精神,是科学所代表的理性、求真、自由等价值。在当前的中国,科学要借助于自身的强势地位推进启蒙的同时,还要重视习俗、情思和热情的作用,注重渐进和平的方式。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理解和思考世界历史中的中国,从而为未来的中国寻找新的可能性和选择。为了推进再启蒙,我们必须梳理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元素及其历史变迁,厘清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元素,并安排这些元素在中国的文化实践,践行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世界之中国”文化建设。(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 时事漫话

# 社会应重塑价值观

■沙森

前不久,郭美美这个因为“红会”事件走进公众视野的“炫富”女孩,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据媒体报道,北京警方已查明,郭美美涉嫌开设赌局,从事性交易、发布虚假信息提高赌博网站知名度等违法犯罪行为。

“郭美美事件”绝不是个案。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世界俨然成为当今社会生态的一个侧面,它像病毒一样,于无声处不断侵袭腐蚀着健康的社会肌理,让高尚的道德情操几无容身之处。在前者的世界中,享乐是唯一价值,而达到享乐的手段更毫无道德和耻感可言。

更可悲的是,这些道德的撕裂和堕落并没有因为不良事件的一再曝光而受

到社会的谴责,相反的,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长期吸引着人们的眼光,甚至成为一些人羡慕和追逐的对象。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对整个社会世风日下的感叹、对道德困境的诘问和对冲突价值观的纠结。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到底是物欲横流的社会扭曲了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越来越多的扭曲价值观“造就”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积累了巨大财富,也将贫富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物质财富的充裕意味着更舒适的生活、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 and 更好的发展机会。日益加

剧的贫富差距逐渐让一部分人的心态失衡,陷入疯狂追逐物质的泥沼;无休止的奢侈靡靡生活、令人发指的追求财富方式、扭曲的价值观,这些仿佛成为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生活的“必需品”。

其实,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将个人扭曲的价值观完全归咎于社会则是对个人责任的逃避。人,作为高级的社会动物,是神性和兽性的结合。毫无约束的物欲是赤裸裸的兽性,而神性,正是道德、伦理、法律的约束。

我们无须抱怨世风日下,也无须羡慕纸醉金迷,只须在心中装着永恒的道德律令,因为你脚下的地方,便是中国。



翟小芸供图

# 美国抗震救灾体系对我们的启示

■金亮

云南鲁甸地震发生以来,我国相关部门组织救灾的力度很大、措施得当,且动作迅速、配合周密,各方面的工作有条不紊,避免了盲目施救的情形出现。我国是地震多发的国家,深入研究其他国家抗震救灾的经验,有利于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抗震救灾体系。

以美国为例,美国地域跨度大,地质结构复杂,也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在多年的防震实践中,美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统一化指挥、调度体系,这套体系在历次地震救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美国非常注重地震灾害的有效预防,加强平时训练与演习,合理规划设置城市的避难场所。美国针对地震灾害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依靠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防震减灾能力。注重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始终把提高建筑物抗震性能作为有效降低地震灾害的重要途径。美国开展了大量研究,开发新技术,对危险建筑物进行加固和修复。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建筑物尤其是生命线建筑的抗震性能,确保已有建筑物的安全。重视科学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发展广泛的合作网络,增进对地震过程和影响的认

识,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提高地震预报与减灾水平。注重全民抗震救灾知识的普及与抗震救灾演练,加强政府各部门抗震救灾的管理协调,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提高地震预报的准确性是世界难题,短时间内难以突破。在地震问题上的侧重点应是减灾。从美国的抗震救灾体系可以看出,科学救灾时期核心理念。从这一点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至少应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切实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性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房子的抗震性能提高了,就能切实有效地减少损失。从2008年汶川地震调查情况可以发现,建筑物的形状对建筑抗震性能影响很大,尤其是建筑平、立面的规则性更是重要。因此,必须控制建筑物形式,加强建筑的规则性审查,要从公共安全角度出发,对一些先天抗震性能不好的建筑采取措施,保证建筑物的安全。同时还要把地震研究与建筑抗震紧密结合,加大建筑物抗震性能及设计方法研究,使新建建筑抗震性能稳步提高,同时加大对原有建筑抗震加固研究,保证不同年代的建筑物基本均能达到较高的抗震性能。

第二,平时做好防震减灾知识的普及与演习训练工作。地震发生往往是突然,没有明确预兆的。多数人在重大灾害发生时惊慌失措,只有平时积累足够多的应急避难知识,加强避难逃生训练,在灾害发生时才可以做到有序而不慌乱,将损失降到最小。在地震预测还没有实现根本突破的情况下,现实的态度是强化预防,改变重救灾防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在板块边缘地区和地震多发地区,要多对公众进行灾害教育,让公众在生活中随时绷紧“这里是地震活跃带”这根弦,知道万一发生了地震该怎么办。有句谚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话用在防灾减灾上,非常贴切。

第三,加强防震减灾设施的规划与建设。设立必要的避难场所,在地震等灾害发生后,灾民有良好的避难场所,对减少损失也很重要。

第四,准确及时地作出地震灾害评估,这是国家启动应急响应的关键环节。此方面应加大研究力度,综合不同学科,如地震工程、结构工程、社会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制定切实可行的灾害应急预案系统,提高灾害救助水平。

其他国家抗震救灾的经验对我国的防震减灾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可见的未来,人类预报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都不可能,因此消除这种自然灾害就更加不可能了。人类只能作一些预防灾害的准备,把灾害来临以后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这种预防工作就是灾害发生前的准备以及灾害发生后的应对。我们应该把灾害对策从防灾转到灾灾减灾,甚至把减灾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纯粹的科学技术是超越其他任何因素的,一是一,二是二,只有尽可能掌握抗震减灾的规律,才有可能最有针对性地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